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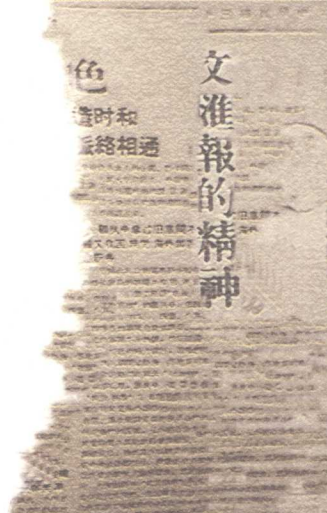


陈建云 著

大变局中的 民间报人与报刊

几许中国新闻历程的碎片，
三个民间报人的艰难抉择，
一段大变局中的自由心灵史。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



陈建云 著

大变局中的 民间报人与报刊

福建教育出版社·福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 / 陈建云著. —福州: 福建教育出版社, 2008. 12

ISBN 978-7-5334-5086-1

I. 大… II. 陈… III. 报刊—文化史—中国—1945~1957 IV. G219.29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41728号

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

陈建云 著

-
- 出版发行** 福建教育出版社
(福州梦山路27号 邮编: 350001 网址: www.fep.com.cn)
- 出版人** 黄旭
- 发行热线** 010-62027445
- 印刷**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(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5区7号楼 邮编: 100070)
- 开本** 700mm×1000mm 1/16
- 印张** 16.75
- 字数** 210千字
- 插图** 35幅
- 版次**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
- 印数** 1—5000册
- 定价** 29.80元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读者服务部 (电话: 010-62027445) 联系调换。

前 言

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李鸿章慨叹：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。从此，我们这个老大帝国步入“变亦变、不变亦变”的艰难境地。改良革命，君宪共和；内忧外患相继，问题主义纷争。1949年10月1日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那大手一挥，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，百年激荡，至此“结穴”。制度跨越，思想扬弃，中国在1949年前后十年间发生的变革，远非李鸿章苦力撑持的晚清可比。

政治角力夹缝中发育起来的民间报人与报刊，在这一历史剧变中遽然转变、消失。徐铸成、王芸生和储安平，无疑是民间报人中的翘楚，他们所主持的《文汇报》、《大公报》和《观察》周刊，曾经声光无限，执民间舆论之牛耳。关于民间报刊，徐铸成有过精辟论断：“一张真正的民间报，立场应该是独立的，有一贯的主张，而勇于发表。明是非，辨黑白，决不是站在党派的中间，看风色，探行市，随时伸缩说话的尺度，以响应的姿态，多方讨好，侥幸图存。”民间报人，信奉的是自由主义办报思想，张季鸾等为“新记”《大公报》定下“不党、不卖、不私、不盲”办报方针，储安平要求《观察》同人共守“民主、自由、进步、理性”之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，便是明证。

但是，中国的民间报人或者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，呈现出与西方自由主义者颇为异趣的价值取向。西方自由主义者虽然不排斥集体、社会乃至国家

的价值，但是更强调个人自由的优先性，他们认为个人自由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出发点，也是所有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。中国的自由主义者，肩负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使命；近代以来国家、民族所遭受的凌辱，使他们在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之间，首先选择的是前者而非后者。明此，便不难理解徐铸成、王芸生、储安平等民间报人，在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！”的1949年，不约而同地选择留在大陆拥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。

作出这样的政治选择，就意味着必须转变原来的立场，放弃自由主义的办报信念。这是他们应该考虑到的问题，也是愿意作出的“让步”——1947年至1948年，知识分子通过《观察》展开的“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”的讨论，虽然莫衷一是，但不少人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心怀忧虑；王芸生等民间报人“第三条道路”的尝试，也被证明无法行通。

我总相信，信念的弃守决非如弃敝屣，义无反顾，朝夕可成。当我拂去历史的尘埃，走进民间报人的悲喜内心的时候，他们在革故鼎新之际的憧憬与彷徨、欣喜与迷惘、奋发与无奈、坚持与哀愁，无不印证着我的直觉，常常让我感慨不已！

1949年6月21日，距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，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已经两年的上海《文汇报》原地复刊，徐铸成特意写了一篇自称“心声之文”的社论，表示今后的《文汇报》人将抛弃旧包袱，学习新经验，真正和人民结合起来，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尽其绵力。但是，《文汇报》在新华社正式公告之前报道长沙解放，被指为资产阶级办报作风——“抢新闻”，编辑将领袖的文章分题刊出以醒眉目，被指为离经叛道，让办了20年报的徐铸成大惑不解。更有甚者，一向被称作社论高手的徐铸成，在新时代竟然不会写文章了，常常舒纸半日却无从下笔，只好请陪他熬夜的朋友代劳。

1949年4月10日，从香港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王芸生，在天津《进步日报》上发表《我到解放区来》一文，声明自己这次到解放区不是为了谋求“中立”、“独立”，而是向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阵营“投降”。信奉司马迁“戴盆何能望天”的王芸生，竟然说出“投降”的话，女儿王芝芙读着父亲的这篇“划时代”之文，不觉泪眼模糊，啞哑无声。随后，他身穿戎装，

随军南下回到上海，于6月16日宣布上海《大公报》“扬弃旧污，开拓新生”——走向新民主主义，走向社会主义。10月1日，王芸生和新政协代表们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，见证“人如大海，旗翻红浪”的共和国开国盛典，“庆幸个人此生不虚，更庆幸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人民民主的时代”。不过，在举国欢欣昂扬的大乐章中，王芸生身历了几个意想不到的插曲，让他感到些微的失落、沮丧：他因为获得过《大公报》的“劳绩股”，在加入工会时遇到了麻烦；有人说他长期以来一贯“反苏”，反对吸收他加入中苏友好协会；他应邀到儿子读书的学校演讲，演讲中特别谈到了一段“三毛流浪记”的故事，不料受到校方的当场批判。

1949年11月1日，年前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的《观察》，在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即获复刊。自称生命、思想、感情在解放后都跨进了一个崭新境界的储安平，在《观察》复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跟着中国共产党走、为人民民主事业努力的“表态”文章。这篇充满当时流行的报刊语言的文章，如果与储安平往日客观超然、真知灼见迭出的文章放在一起，很难让人相信是出自同一人之手。《观察》虽然复刊了，但是刊物的志趣、理念和内容都发生了质变。在这个“脱胎换骨”的过程中，储安平等《观察》同人经历着精神的阵痛：“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中，许多人从旧的社会中解放出来。从旧社会中解放出来的人们，虽然具有同样的学习的意愿，力求进步，但是由于过去的环境和训练，各不相同；有些人比较坚定，有些人比较摇摆；有些人包袱丢得快，有些人包袱丢得慢。在思想的改造中，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或长或短经过一番苦痛的时间的，但我们显然需要有勇气来克服这种苦痛。”

……

历史因特别的人而丰满，人因故事而鲜活。

民间报人的转变和民间报刊的消失，是那个时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。然而，宏大的历史叙事，总是有意无意间忽视民间报人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命体温和思想脉动，使本来丰满的历史简单呈现，事实的本真需要索隐。

本书选取徐铸成、王芸生、储安平这三位民间报人，及其所主持的《文汇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观察》周刊，铺排史实，索隐钩沉，感受他们在大变

局中的思想脉动，演绎历史兴替的逻辑必然。

孟子言：知人论世。世不易论，人亦难知。书中错谬之处，尚祈方家指正。

陈建云

2008年9月 于上海

目 录

前 言 / 1

已将书剑许明时——徐铸成与《文汇报》

- “《文汇报》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” / 3
- 香港《文汇报》“色彩不宜太红” / 19
- “独立”何以“左传” / 27
- 欢乐中的迷惘 / 37
- 从《文汇报》到《教师报》 / 46
- 《文汇报》“失而复得” / 58
- 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 / 65

两姑之间难为妇——王芸生与《大公报》

- 《大公报》社论作者是“法西斯的有力帮凶” / 83
- “王芸生君是双料的新华社应声虫” / 92
- “世界需要中道而行” / 102
- 胡政之“国门边上”的努力 / 111
- “我到解放区，我投降来的” / 120

上海《大公报》宣布“新生”	/	133
躬逢开国大典，庆幸此生不虚	/	139
何意百炼钢，化为绕指柔	/	141

自由主义者的悲歌——储安平与《观察》

“《客观》就是《观察》的前身”	/	151
“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”	/	157
民主·自由·进步·理性	/	165
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	/	180
动荡时局中的那颗平静之心	/	186
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	/	194
欲采蘋花不自由	/	207
此《观察》非彼《观察》	/	217
自由主义的回光返照	/	228

已将书剑许明时

徐铸成与《文汇报》

「《文汇报》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」

香港《文汇报》「色彩不宜太红」

「独立」何以「左传」

欢乐中的迷惘

从《文汇报》到《教师报》

《文汇报》「失而复得」

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

“《文汇报》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”

徐铸成不是《文汇报》的创始人，但《文汇报》能够成为旧中国广有影响的报纸，与徐氏的一支如椽之笔分不开。报因人名，人以报传，徐铸成光大了《文汇报》，《文汇报》也成就了徐铸成。徐氏曾自豪地说，《文汇报》是用自己的墨汁“喂大”的。考察《文汇报》的发展历程，这话的确不是妄言。

1937年11月13日，上海陷于日寇之手，不过上海各报在成为“孤岛”的租界仍可以照常出版，大体上还能保持原有的爱国立场。一个月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，日本占领军通知上海租界各家中文报纸，自12月15日起必须接受新闻检查。租界当局无奈，只好向日方屈服。当时上海有影响的报纸，除《新闻报》和《时报》接受检查继续出版外，《申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时事新报》、《民国日报》、《立报》义不受辱，纷纷停刊或迁移外地出版。

接受日方新闻检查的《新闻报》、《时报》被人唾弃，新出版的《新申报》等汉奸报纸更为人所不齿，而上海市民又急于知道抗战新闻和战局形势——旧中国新闻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一度出现了“新闻真空”。《文汇报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“应运而生”的。

《文汇报》不是由一个或几个资本家创办的，也没有任何政党作后台，而是由几个并无资财的人，偶然凑合起来的，这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，可以说是一个创例。在发起创办《文汇报》诸人中，出力最巨者首推严宝礼。

严曾任沪宁、沪杭两路路局会计处稽核，办过广告公司，主要经营路牌广告，也代办报纸广告，在新闻界颇有朋友。1937年初，两路局部分中层职员成立“新新俱乐部”，在南京路一家旅馆长期包房，作为工余娱乐消遣之用。严宝礼是俱乐部中最为活跃的人物。抗战爆发后两路局遣散大部分职员，这些俱乐部成员拿到了不菲的遣散费。此时上海不少报纸停办，一批失业的报界人士，如《新闻报》的严独鹤和徐耻痕、《申报》的金华亭、《社会日报》创办人胡雄飞、《生活晚报》社长吴农花等，也常来俱乐部聚谈散心。闲谈中，胡雄飞向严宝礼等提议，用俱乐部成员手中的两路局遣散款办一张新报纸，这样大家有事可做，也不至于坐吃山空。胡的提议得到了以严宝礼为首的多数人的赞同，大家认为当时在上海办报，销路不愁，再说办报本轻利重，而且名利双收。当然，通过办报宣传爱国抗日，获得国人好评，也是这些人的共同愿望。¹

为避开日方新闻检查，这帮人决定借鉴上海《大美晚报》和《华美晚报》的做法，挂洋商牌子，聘请英国人克明（H. M. Cumine）任发行人和董事长。经过短期筹备，《文汇报》于1938年1月25日正式创刊，克明任发行人兼总主笔，严宝礼任经理，胡雄飞任协理兼广告科主任，胡惠生任总编辑。在创刊号上，以“本报发行人兼总主笔”克明的名义发表了《为本报创刊告读者》：

余前办英文文汇报时，即抱中英合作之宗旨，今发行华文文汇报，当亦本此宗旨，盖中华民族不仅有悠久之历史，为东亚文化之策源地，而且地大物博，实蕴藏无限之宝藏，其前途之远大，更非他国所能企及。英国乃一民主国家，对于他国均抱善意合作扶助其成长的态度。英国人民对于中国尤有好感，不但爱好其文化，抑且深信中国的复兴民族建立新国家，必有待与英国的合作。所以本报刊行的宗旨自在鼓吹中英合作，此其一。

依余所信，中国未来的政治，必渐趋于民主化之一途，惟民主国家的培养与形成，必待报纸的启迪民智，养成民主政治的氛围，而报纸如何始能完成其任务，尤必赖言论的自由。英国之所以成为民主国家者，实由其国内言论自由，不受丝毫的统制。是以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最高原则，绝不受任何

方面有形与无形的控制，如不幸遭受外界的阻力，余必负责设法消除之。此其二。

报纸是人民的精神食粮，其所负的使命，一则为灌输现代知识，另则为报道消息，是以报纸的生命，在其独立的报格，不偏不倚，消息力求其正确翔实，言论更须求其大公无私，揭穿黑幕，消除谣言，打破有闻必录之传统观念。所以本报同人必遵行此记者纪律，始终不渝，以建树本报高尚之报格。此其三。

最后，有不得不郑重声明者，即本报刊行，绝非为投机取利，而实为应环境需要而产生，故必竭本报同人之力，为社会服务，凡若有利于社会公众之事业，无不欲先后兴办，以谋大众之幸福，而副读者之期望也！²



《文汇报》创刊号发表的《为本报创刊告读者》

《文汇报》创刊时，徐铸成已被《大公报》总经理胡政之遣散，闲居上海。徐铸成1927年冬在北师大读书时，就进入胡政之开办的国闻通讯社，两年后调到天津任《大公报》编辑，颇受总编辑张季鸾赏识，不时外派采访重要政治新闻。1932年至1935年，他被外派到汉口，任《大公报》驻汉口特派记者。1936年《大公报》上海版创刊，他又被调到上海任要闻编辑。《大公报》的人事安排一向由胡政之负责，徐铸成进入《大公报》后受到不断提拔，可见胡对他是器重有加的。胡政之不止一次勉励徐铸成要以《大公报》为终身事业，徐也一直把《大公报》视为自己的“家”，勤奋工作，以报胡政之的知遇之恩。不料日寇侵华，“深怀文章报国之志”的上海《大公报》人誓不投降，拒绝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，宣布自动停刊。报纸停刊次日，胡政之即宣布除留下副经理李子宽等少数人负责善后外，其他员工一律就地遣散，各谋生路。徐铸成亦在遣散之列，他第一次尝到了失业的痛苦，六口之家的生计顿时失去着落。徐铸成失业后，幸有原来的同事、正在重庆担任《国民公报》总编辑的杜协民，约请他担任该报驻沪记者，月薪四十元，聊

以缓解燃眉之急。虽然他后来再次被胡政之邀入《大公报》，但对老板一脚把自己从《大公报》这个“家”中踢出的铁面寡情，始终不能释然于怀。

《文汇报》创刊在即，可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社论写手。严宝礼得知徐铸成的境况后，就派储玉坤约请徐铸成成为《文汇报》撰写社论。储玉坤是徐铸成的宜兴同乡，刚从接受日方检查的《新闻报》愤而辞职，应聘《文汇报》任国际版编辑。严宝礼开出的条件为：徐每天为《文汇报》写一篇社论，每篇四元计酬，待营业发展后升为十元（暂以四折计薪）；言论没有限制，题目和内容，一切由徐决定，报馆保证不加删改。优渥的稿酬对徐铸成来说不啻雪中送炭，不过更吸引他的是自己可以放言高论，一天一篇社论等于是包办了《文汇报》的言论，这对一个报人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徐铸成当即应承下来，并找来同被胡政之遣散的杨历樵，分担国际问题的社论写作。

7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小心翼翼地翻阅着一张发黄了的《文汇报》，仍能感受到徐铸成当年奋笔疾书时的慷慨激昂，被他那支千钧之笔流淌出的文字所震撼。徐铸成所写的、也是《文汇报》发表的第一篇社论是《淞沪之役六周年纪念》：“吾人认为中国民族前途之光明，于一二八之役已吐露其曙光矣。今中国军民如能本一二八之役的精神，坚持到底，最后胜利自可从万分艰苦中获得。”³他告诫上海市民“地球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孤岛，上海尤其不能和内地脱离关系；四周的巨浪，随时可以把你们吞没；天空的铁鸟，随时会震伤你们的心弦；你们应该时时刻刻紧紧把握住你们的灵魂，应该时时刻刻记住你们处的地位；为了你们自己，不应该再这样苟安逸堕；为了你们的子孙，更应该时时有所警惕。”⁴对上海工商界等几个想投敌的“软骨头”，他又撰写了《告若干上海人》社论，严正警告这些人赶快悬崖勒马，不要“去当小丑”，“你们要继续循着正路向前走，切勿恋着昙花一现的幻境，被漫天的风沙，葬送了自己！”⁵

《告若干上海人》发表后翌日，报馆接到恐吓信，说《文汇报》言论激烈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今后若不改弦更张，再有反日情绪，将有杀身之祸。第二天，报馆即受到暴徒炸弹袭击，造成职员死伤。徐铸成闻讯后既愤慨又不安，打电话问储玉坤社论要不要继续写，如果改变态度，宁愿搁笔。储玉坤请示严宝礼，严斩钉截铁地回答：照样写下去！2月12日，《文汇报》发

表《写在本报遭暴徒袭击之后》社论，指出炸弹的光顾、黑暗势力的进攻，正足以证明同人的苦斗已获得相当成效，发誓“愿为维护言论自由奋斗到底”。

《文汇报》开办费仅有七千元，根本买不起印报机。严宝礼向留守上海《大公报》的李子宽求助。李子宽请示胡政之后，同意以优惠价格承印《文汇报》，卷筒白报纸也由《大公报》垫用，费用日后结算，同时把《大公报》设在福州路的营业部租借给《文汇报》作馆址。可以说，《文汇报》是“借鸡生蛋”，在《大公报》的支持和帮助下才得以问世。胡政之如此慷慨地帮助《文汇报》，除了《大公报》自身利益的考虑，也是看重《文汇报》的爱国立场。

有了这层关系，胡政之当然会关注《文汇报》的情况。就在报馆挨炸的那天下午，胡政之约见了徐铸成。落座后胡一反平常的严肃态度，含笑问徐：“《文汇报》的社论，很像是我们自己人写的。你知道是谁写的吗？”徐立即回答：“是我学写的，胡先生一定看出它的肤浅、幼稚吧。”胡连忙说：“不，不，写得很有文采，构思也很深刻。就是有些地方，太激烈一些，怕出问题。”⁶当徐铸成把报馆已经挨炸、严宝礼坚持报纸态度不变的情况告诉胡政之后，胡终于说出了自己约见徐的用意：《大公报》投资一万元与《文汇报》合作，条件是徐铸成进《文汇报》负责编辑部，抓言论方针。

徐铸成同意进入《文汇报》，胡政之即派李子宽与严宝礼商谈具体合作事项。双方很快达成协议：《文汇报》原始资金升值为两万元，《大公报》投资一万元（分月在排印费和填付白报纸项下扣除），双方所占股份为二比一。

1938年2月下旬，徐铸成走马上任，以主笔名义主持《文汇报》编辑部，从此和这份报纸结下了二十年“牢不可破”的关系。

严宝礼对徐铸成的赏识之深、任事之专，在中国新闻史上堪称佳话。当他和李子宽谈判《文汇报》与《大公报》合作时，《文汇报》的一些董事，对于《大公报》方提出要徐铸成主持《文汇报》编辑部这一条件，颇有异议。严宝礼力排众议，坚决认为徐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新闻人才，一口应承。徐铸成入《文汇报》后，严宝礼委以他“主笔”职务，并授予处理编辑部大

权，使他的权力凌驾于总编辑之上，这种人事安排在当时的报馆中是独一无二的。为了使徐铸成把《文汇报》当作自己的事业，严宝礼除了为徐制订高额薪酬，还特意把《文汇报》“发起股”一千元让给徐，使他成为报纸的股东之一。

严宝礼如此器重徐铸成，当然有功利的一面，就是仰仗徐氏的一枝健笔使《文汇报》赢得读者，扩大发行，招徕广告，从而获得经济收益。不过，也不能否认两人在办报思想上有契合之处。实事求是地讲，严宝礼在策划创办《文汇报》时，办报思想还是模糊的，只有一个笼统概念，仅仅认识到报纸对于社会的功效不可估量。但是随着筹备工作的推进，他的办报思想逐渐清晰。据储玉坤回忆，在《文汇报》出版之前，严宝礼曾让他写一篇“发刊辞”，向读者宣布《文汇报》的办报方针，表明报纸的态度和立场。严提出四条意见作为“发刊辞”框架：（一）主持公正言论；（二）树立高尚报格；（三）有独特之消息；（四）无外来之阻挠。《文汇报》创刊当天发表的《为本报创刊告读者》，虽由克明署名，实际上是由储玉坤遵照严宝礼的意见执笔撰写的，最后征得其同意定稿，可以视为严宝礼的办报思想。⁷ 对于一个从没有新闻从业经历的人来说，严宝礼能够提出以上四点意见作为《文汇报》的办报方针，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出手不凡和立意宏远。徐铸成成为《文汇报》“学写”的《上海并非孤岛》、《告若干上海人》等社论，才气横溢，文笔犀利，真知灼见，深入浅出，言人所不能言、不敢言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，使严宝礼确信这样的人与文，正是《文汇报》所需要的，与自己为报纸定下的“主持公正言论”、“树立高尚报格”等方针不谋而合。因此，即使报馆因徐的激烈之文而受到暴徒炸弹袭击，即使其他同事反对，严宝礼依然支持徐放言高论，并把他延揽入报馆主持编辑部。可以说，没有严宝礼，《文汇报》不可能呱呱降生；没有徐铸成，《文汇报》也不可能异军突起，光焰万丈。后来《文汇报》停刊，徐铸成重入《大公报》，辗转香港、桂林、重庆，留在上海的家人一直由严宝礼照料，柴米无缺，安度过了漫漫长夜。抗战胜利后《文汇报》复刊，徐铸成毅然离开《大公报》，再次与严宝礼携手，这未尝不是一个有力因素。严宝礼与徐铸成的关系，颇有些“管鲍遗风”。⁸